

元前《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王涛 著

线装书局

元前《史记》
诠释文献研究

王涛 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元前《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 王涛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4. 8

ISBN 978-7-5120-1509-8

I. ①元… II. ①王… III. ①《史记》—研究—文集
IV. ①K204.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6245 号

元前《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著 者: 王 涛

责任编辑: 杜 语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济南宏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23.80 元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两汉时期《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4)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及诠释文献概况	(4)
一、西汉	(4)
二、东汉	(8)
第二节 评议类《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10)
一、评议者生平	(12)
二、文献资料状况	(18)
三、评议内容	(23)
四、个人特色及整体面貌	(29)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34)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及诠释文献概况	(34)
第二节 评议类《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36)
一、评议者生平	(36)
二、文献资料状况	(45)
三、评议内容	(46)
四、个人特色及整体面貌	(52)
第三节 注释类《史记》诠释文献——《史记集解》研究	(56)
一、作者生平	(57)
二、文献征引	(59)

三、训释内容及训释方法	(67)
四、考辨正误	(74)
五、校勘	(78)
六、辨伪和辑佚	(80)
七、不足	(81)
第三章 隋唐时期《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84)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及诠释文献概况	(84)
第二节 评议类《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87)
一、评议者生平	(87)
二、文献资料状况	(93)
三、评议内容	(97)
四、个人特色及整体面貌	(101)
第三节 注释类《史记》诠释文献——《史记索隐》、 《史记正义》研究	(105)
一、作者生平	(106)
二、文献征引	(108)
三、训释内容及训释方法	(117)
四、考辨正误	(128)
五、校勘	(131)
六、目录、辨伪和辑佚	(133)
七、其它	(138)
八、不足	(141)
第四章 宋、金时期《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143)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及诠释文献概况	(144)
一、北宋	(144)
二、南宋	(145)

绪 言

西汉司马迁所写的《史记》，是我国史学史上一部继往开来的煌煌巨著。它开创了纪传体正史体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①，熔天下之书于一书，兼取金石、谣谚等，大大拓宽了史书的取材范围。不仅创造了不同于《春秋》等编年体史书的体式义例，也弥补了《国语》、《战国策》等国别体著作就事论事、缺乏关联性和系统性的缺点。首创了以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为中心，贯通古今、网罗万事、察其始终、兼及文化制度的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的形式。其独特的篇章安排方式，更是达到了使序事首尾完整、正名实、寓褒贬的特别效果。以黄帝为始，衍及三代、秦汉君王诸侯、四方民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②，开创了为后世所尊奉的肯定发展、进步与变化的朴素唯物、大一统的历史观。宣扬了不唯上、只唯实，以德为治、顺民之欲的政治观。首创民族史传，表现了民族一统、和睦平等的思想。首立经济史传，述货殖、叙平准，为商人立传，阐述了人欲动力的经济思想。采用互见法、对照烘托法等手段，加以洗炼的语言、故事化的情节结构、精致的细节描写和夸张渲染的大场面描写等文学手法，塑造了数百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达到了传记文学新的高峰……^③。正因为如此，自西汉后期起，《史记》一书便逐渐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喜爱和推崇，历代许多学者对其展开了各种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成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9—3320页。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③ 张大可：《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以上内容多据该书而成。

果,从而形成了“《史记》学”这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专门之学。历代学者的研究工作,包括增补,诠释,研究其取材、体例、版本、与它书(尤其是《汉书》)的异同比较研究等各个方面。其中诠释是《史记》研究中基础性的、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方面,所产生的直接文献成果,据粗略统计,至少有著作三百余部,论文四千多篇。间接涉及到的其它文献,更是难以计数。可以说,《史记》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对《史记》研究文献的研究,而对《史记》研究文献研究的基础和主体则是对《史记》诠释文献的研究。

从《史记》诠释文献研究自身来说,两千年《史记》诠释文献研究的方面和内容,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术的发展以及研究者阵容的不断扩大而逐渐丰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时代不同,社会文化、学术背景不同,《史记》学研究的发展程度不同,研究者个体兴趣、专长各不相同,研究的内容和侧重点也就不尽相同,各个时代《史记》诠释文献的研究与其它时代相比也就在整体上呈现出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特色的状况。笔者认为,《史记》诠释文献的研究应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该类研究的内容是如何传承、转变、发展进步的?这些传承和发展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文化及学术背景的影响?各个时代的研究相互之间又表现出了哪些异同之处?《史记》诠释文献的发展又体现出了什么样的规律性?要较好地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所有的《史记》诠释文献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

据笔者所掌握的相关材料来看,迄今为止,对“《史记》诠释文献研究”这一课题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这类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亟须予以加强。

有鉴于此,笔者力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元前《史记》诠释文献作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科学梳理和研究,把相关的《史记》诠释文献按体式分为评议类、注释类、解题类、考证类等几个大类,根据其学术研究的整体特点和风貌的不同划分历史阶段,

每个阶段为一章。每一章中,先介绍本阶段《史记》诠释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情况,再概述该阶段《史记》诠释文献的体式类型、变化发展等情况,再对每一体式类型的文献分别进行专节讨论,考稽文献撰写者生平和文献资料状况,论证文献的诠释内容、观点及方法等,力求对各阶段《史记》诠释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通过采取以上研究论证方法,在理清元前各个历史阶段《史记》诠释文献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进行文献的具体解读与挖掘,从中找出大量研究个案之间的学术脉络及学术渊源,找出他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以期较为全面客观地展现元前《史记》诠释文献的实际状况、主体风格及其内部发展的多样性,以求显示元前《史记》诠释文献的整体风貌及其价值,促进《史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今后撰写《中国古代〈史记〉诠释文献研究》打下基础。

由于这项研究涉及到的相关文献成果数量庞大,研究任务较为艰巨,而笔者学识尚浅,加之时间紧促,论文的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学者多多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第一章 两汉时期《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史记》一书名称颇多,司马迁本自题为《太史公书》,汉代人或将其省称为《太史公》,或别称为《太史公记》,后来又有据《太史公记》省称为《太史记》的。最早称之为《史记》的是东汉献帝时荀悦的《前汉纪》,这又是《太史记》的简称了。但这时还和《太史记》等名称交并相存。三国、两晋以后,才渐渐以《史记》作为该书的专名相承使用下去。^① 所以,历史上指称该书,两汉时大多使用《太史公书》的名称,东汉末以后则使用《史记》之名。不过,本文中为避免称引混乱,除非极有必要的情况,一般就用《史记》而非《太史公书》之名来指称它。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及诠释文献概况

一、西汉

原名为《太史公书》的《史记》一书,自其撰成之后,至西汉末期百余年的时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始终无法广泛流传,这限制了相关的研究和诠释工作的进行。

《史记》的祖本,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应该有两个,一个“藏之名山”,一个“副在京师”^②。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根据《穆天子传》郭璞注的解释,认为“名山”就是“古帝王藏

① 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6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20页。

策之府”。^①也就是说,《史记》完成以后,录成正、副两个本子。正本收藏在官方藏书处,副本留在京城长安(司马迁家中)。这就是《史记》最早的两个本子,这两个本子由于相似的原因,都被较为严格地控制起来。考察其原因,首先在于《史记》的内容和思想在当时人的眼中如班固所批评的那样“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②,与当时已经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在政治观、价值观和义利观等方面都差异很大。其次,书中对包括高祖、武帝在内的汉代历朝统治者的阴暗面都有所揭露,所以不能受到西汉统治者的欢迎,也就无法像后来的《汉书》那样借助政权的力量得到推广。还有,书中许多内容涉及到统治者十分重视的“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③等政治权术、军事谋略等知识,所以这个收藏于皇家藏书处的正本,被统治者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不被允许轻易外传。由西汉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以皇帝叔父的身份上书朝廷欲求诸子及《史记》一览而被拒绝一事,即可见其一斑。例外的如班固的伯祖班固,他因为奉诏进读群书得到哀帝的赏识,而得到过《史记》等皇室秘书副本的赏赐^④,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至于收藏于司马迁家中的副本,同样沉寂了很多年后才由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⑤,开始慢慢向外流传。但这种流传的速度之慢,范围之窄,也是达到了相当少见的程度的。杨恽在西汉上层分子之间“宣布”《史记》在宣帝之时,而那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20、3321页注文。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史记》学上将其术语化为“史公三失”。

③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24—3325页。

④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03页。

⑤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页。

段时间刘宇还没有被封为东平思王,正作为宣帝的皇子也生活在京城长安,在同一个城市同样的上层分子的活动圈子里相处多年,刘宇却显然一直未能得《史记》一读,足见该书流传范围之窄、速度之慢到了什么程度。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其子元帝继位后,东平思王刘宇按照汉家制度离京,在东平国的封地上生活了十六年而元帝崩、成帝即位,而刘宇向成帝求书的时间又差不多在五年之后,距离杨恽对外“宣布”《史记》之时至少相隔了二十多年。尤其求书被拒一事可知,终刘宇一生,应不曾得《史记》副本一见,作为皇子、亲王尚且如此,其他又能有几人例外?这种民间传书的局限性,受制于当时只能用简帛传抄的物质条件是一方面,但显然更主要的还在于政府有意识的控制。

总之,终司马迁死后的西汉后期百余年,《史记》的正、副两个藏本,开始阶段闻其名者甚少,杨恽“宣布”之后,知者略增,到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相继撰成《别录》和《七略》,将其列入正式的官方书目之后,才为更多的人所知,而即使大家有所耳闻,该书也始终处于秘藏难见的状况中。当时有机会接触到此书的人,只有四种:一是像班固这种有机会得到皇帝赐书的幸运儿,有史可查的甚少。二是杨恽向之宣书的社会上层分子,据以上分析,可见数量也很有限。这两种人大多数并非专门的修史之士,求得其书多不过是为了一快耳目而已,所以在《史记》研究史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上对该书进行诠释研究了。第三类人,是少数拥有职务之便能够经常接触到官方藏书的高级文人。他们研读此书的原因,或者是基于个人对《史记》的强烈喜爱,如生活时代紧接司马迁之后的博士褚少孙;或者是奉朝廷命令整理皇家藏书,如刘向、刘歆父子;或者直接奉诏修史,如冯商、孟柳等。比之前两类人,他们既有钻研此书的充分动力(强烈的个人爱好或者庄严的官方使命),又有研究所需要的足够的专业技能(都是当时得到朝廷公认的硕学大儒和史学家),所以他们才是西汉时期真正有条件对《史

记》进行研究和诠释的人。此外,还有一些朝廷重臣,如桑弘羊、王凤等,他们阅览该书往往是为了从中吸取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经济、军事知识,因此拥有他们独特的视角。但可惜的是,由于司马迁晚年可能还在不断地对《史记》进行修改和补充,致使此书内容与《太史公自序》以及《报任安书》中所描述的出现了不少差异,而其去世前又未来得及将其完全整齐划一,加上该书传本稀少,收藏中长期缺乏关注,还有简牍的容易朽坏,以及可能的在收藏过程中不经心的转移搬动等因素影响,所以到司马迁之后不久的褚少孙观书之时,书中的一些篇卷已经出现前后不完全相符甚至散亡的现象,而且此后这种趋势还在慢慢加剧。所以理所当然的,当时摆在褚少孙、刘向、刘歆和冯商这些人面前最首要和最迫切的任务,不是诠释,而是整理,具体说就是补写和续修,而这也本就是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接触此书的原因。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意图的高度的一致性,决定了西汉时期《史记》研究中这种重整理、轻诠释的趋势和特点的形成与延续。

具体来说,当时补写者的代表是褚少孙,他所补写的内容,都用“褚先生曰”的字样标示出来。至于其他的补写者及其补写内容,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就模糊难辨了。续修《史记》的人,据典籍记载,大约有“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即阳城衡)、扬雄、史岑……”^①等,他们“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单独别行”^②。这些续作,后来成为班彪、班固父子相继写作“后传”及《汉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纵观司马迁死后的整个西汉后半期,当时名为《太史公书》的《史记》一书,主要因为政府基于政治控制的考虑而难以向外流传,在这种不被关注的情况下,一些篇卷慢慢散亡,这就决定

① 刘知几撰 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8页。

② 张大可:《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了当时极少数拥有特权可以接触到它的高级文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补写和续修此书的抢救工作方面,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以后逐渐展开了。

在以上所述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背景下,西汉时期,《史记》诠释工作还处在萌芽状态中,因此专门的诠释文献还不能出现。但是,在西汉末扬雄、桓谭等人的有关著作中,已经零星地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评论,这可以看作是评议类《史记》诠释文献的先声。

二、东汉

东汉光武帝刘秀克复大统之后,极端动荡、混乱的社会秩序重新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政治、经济上的稳定和发展既给文化重建提供了条件,也向其提出了总结历史教训,反思兴衰成败原因,为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和谐的人文环境和文化动力的新要求。能够对这些要求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的,一个是经学,一个就是史学。所以它们得到了以光武帝为首的统治阶层的充分重视。杜林、陈元、班彪、班固等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一大批学养深厚的今文经学家和史学家的存在,也在人才层面上提供了立即可以拿来使用的丰富资源。从史学上讲,富含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社会文化制度和学术知识,尤其擅长于探讨天人关系,总结人事变迁、制度革替、王朝兴亡经验教训,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史记》的存在,更是在文献资料层面给这些希望通过继承和改造文化遗产而为当世政治、经济需要服务的知识精英们提供了极为恰切而宝贵的资源。所以这个时期,《史记》的流传范围逐渐扩大。但是班彪、班固父子,仍然不满于前人续修《史记》的“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感众,不当垂之后代”^①,于是模仿司马氏

^① 刘知几撰 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8页。

父子递相修史故事,相继撰成了“后传”及《汉书》。《汉书》一经产生,由于它专叙刘氏西汉一朝的皇朝历史,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很快就大行于世,被看作是五经之亚,取得了国史独尊的地位。而由于《汉书》在体例结构等方面都从《史记》借鉴很多,所以它的产生和大兴又倒果为因地反过来促进了《史记》的流传。

在这借鉴《史记》修撰新史的过程中,班彪隐约产生了“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①的史学史意识,于是他和儿子班固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史记》热情而细心的研究者,根据当时的正统的政治观念和史学观念对其编纂体例、取材、文风、史风、思想等进行了空前细致和深入的探讨和批评。

东汉时对《史记》进行评议的还有王充、卫宏、张衡、王允、颍容等人,他们对该书的认识,多多少少都受到了班氏父子观点的影响,也没有超出班氏父子的研究水平。虽然这些东汉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依然没有促成相关的专门研究著作的产生,但在他们那些非专门针对《史记》而撰写的著作以及后人为他们所做的史传中,新的探讨和批评出现的频率明显提高,体现了当时评议类《史记》诠释文献对该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班氏父子著名的史公三失说,已经隐然提出了《汉书》优于《史记》的观点,而王充《论衡·超奇篇》直接将两书进行比较,提出“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②的论断,更是开启了马班优劣、抑马扬班的先河,这也是当时几乎所有评议类《史记》诠释文献中体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的时代学术特点。

东汉后期,对《史记》的诠释工作,还出现了新的内容:注释。此类文献,以释音、释义为主,有的兼及考证。其文献成果,据司马

① 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4页。

②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5页。

贞的《史记索隐后序》记载,包括延笃的《音义》一卷,以及后来无名氏的《音隐》(中华书局本《史记索隐后序》作“《章隐》”,应三玉认为“乃沿袭汲古阁单《索隐》本而讹”^①)五卷。这两部著作,由于自身学术价值不是很高,在学术史上名声不大,加上年代比较久远,导致其文本过早亡佚,只有少量条目为后来的《史记》三家注等引用、保留,故后文中将不再对其进行专节讨论。

第二节 评议类《史记》诠释文献研究

当《史记》在西汉末年逐渐开始流传的时候,除了增补、续写的工作以外,评议的工作也已经开始,并且作为最早的《史记》诠释工作慢慢发展起来。那么,《史记》的评议工作最早是由谁开始的呢?据笔者掌握的情况,评议类《史记》诠释文献的相关资料,目前以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在《历代名家评〈史记〉》^②中收集得较为齐全,而根据他们在该书中收录资料的情况看,似乎最早的《史记》评议者应该是西汉末的扬雄和桓谭。但是在细致地梳理早期《史记》相关的各种资料之后,笔者认为应该更早一些。毕竟从《史记》基本撰成到扬雄在《法言》中正式从学术的角度对它进行诠释研究之间的半个多世纪里,尽管统治者对它的流传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措施加以控制,却还是有一些当时统治集团中的精英分子接触到、甚至整理过这本奇书的,所以如果说一点诠释成果都没产生过,恐怕于理不通。至少,笔者根据自己已掌握的资料,认为最早的《史记》评议者,应该是《史记》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褚少孙

① 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

②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或者西汉成帝时的大将军王凤。

一般《史记》学史上提及褚少孙,都是把他作为《史记》的补写、整理者来研究的。但是仔细研究《史记》中标有“褚先生曰”字样的资料,会发现褚少孙除了做了补写亡篇残卷(如《三王世家》和《龟策列传》),补充资料(如《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等工作外,还对一些篇卷内容作了评议,或者阐述其宗旨,或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三代世表》、《陈涉世家》、《日者列传》)。最后这一种工作,已经算得上是评议性诠释的内容了。至于王凤,虽然他并不是一位学者,却在东平思王刘宇向朝廷求观《史记》等秘府书籍的时候,向汉成帝阐述该书所具有的政治、军事价值,从而使成帝下决心拒绝了东平思王的请求。显然,他评述该书政治、军事价值的这段话,也已经属于评议性诠释的范畴了。由于褚少孙和王凤二人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而学界对褚少孙补写、评议《史记》的时间尚存争议(对这个时间,学界多数人支持汉代张晏的看法,认为褚少孙是元、成之间为侍郎,并在这个时期补写《史记》)。但是南昌大学易平教授则认为“褚生于宣帝甘露间为博士,补《史》在宣、元之际”^①。如果按照前一种观点,那么当公元前二十七年左右王凤谏拒东平思王求书的时候,褚少孙虽然已经作了侍郎、接触《史记》了,却大概应该还没有补写完成。而如果按照后一种观点,那么褚少孙补写、评议《史记》的时间显然要更早一些,所以笔者现在还无法断定两人中哪一位评议《太史公书》的时间更早一些。不过这已经足以把《史记》评议性诠释开始的时间上推到扬雄之前了。

包括褚、王在内,整个两汉时期《史记》的评议者主要有十一位。笔者将这十一位评议者分别归入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两个阶

^① 易平:《褚少孙补〈史〉新考》一文,载台湾《台大历史学报》2000年6月第25期。